

李松柏

個人簡介

1927 年生於廣州。少時在廣州河南讀小學，七歲隨家人赴港定居，入讀東華義學。1941 年，香港淪陷，次年離港返鄉，入住沙園兒教院。在兒教院時，曾接受體能訓練，參與搶救工作。1944 年，升讀力行中學，並隨學校撤退。戰後，回到廣州。1946 年，回港生活。

童年生活

1927 年，我在廣州市河南區洪聖廟附近的地方出生。大概六歲時，我在廣州河南讀小學，讀了幾個月。這算是我第一次讀書，因為我並沒有讀過卜卜齋或幼稚園。¹為了聯絡感情，那時學生要搬兩筐水果去學校，希望老師對自己的印象好一點。小學是私塾式的，規模很小，全校只有二、三十個學生。它雖是男女校，但男生較多。當時我們不用穿校服。學校是全日制的，中午我回家吃飯。雖然年紀小，但學校就在家附近，所以不用家長接送。學科方面，我們沒有讀古文，但會讀《三字經》和《千字文》，那時的啟蒙課文，就是讀「人之初……」。記得開學當天，天剛亮，我們就要帶一塊紅布進洪聖廟拜菩薩，又請老師用朱砂筆在《三字經》上圈點微批。²我們有時會整天念《三字經》，有時在九宮格上練習書法，就是臨帖鉤摹，有時還會學算術。

七歲那年，父親把生意轉移到香港，我和哥哥、姐姐、弟弟便跟隨父母到香港定居。這也是我第一次來香港。原本父親在廣州開了一間生產龍門粉和雞仔粉的工廠，³聘請三十多個工人，產品也銷售到香港。後來生意不好，就搬廠了。那時坐火車從廣州來香港，甚麼證件都不用，基本是兩地相通的。那時的火車是靠燃燒煤炭推動的，車速很慢，差不多要走三、四個小時才到香港，總站就在九龍尖沙咀。到了香港，我們一家六口就在灣仔軒尼斯道地下，租住一個單位，租金是每月一元。後來，爸爸去了打工。

香港生活

在香港時，我考進駱克道附近的東華義學，⁴在那裡讀一年級。學校位於一座四層高的大廈頂層，地方很大，裡面沒有分間課室。戰後這類學校全清拆了。那時一年級有三、四十名

¹ 卜卜齋為廣東俗語，指傳統私塾。

² 圈點又稱句讀、句逗，即傳統讀書人以圈點法在書上加注記號。

³ 龍門粉為廣東惠州龍門縣特產，以優質冬米配以獨特泉水精製而成。雞仔粉乃以純正的粘米磨漿炊曬加工而成，因外形似小雞而得名。

⁴ 東華義學創辦於 1880 年，類近傳統學塾，主要教授中國傳統文化。

學生，男生較多。學校不同年級的學生是分開上課的，我們一年級只有一班，二、三年級的同學就安排在其他地方上課。上課時，我們說廣東話。我們上學要穿校服，它是灰色唐裝，是對胸衫來的。與河南小學相比，東華義學學科較多，包括作文、算術、國文、英文等，好像還有尺牘、美術和體育，不過較少上體育課。那時我最喜歡上作文課，因為可以運用想像力，構思一些新事物。學校很少課外活動，我們沒有時間打球，也幾乎沒有機會旅行。每天放學後，我們就回家。

十歲時，父親去世了，家中的經濟來源突然中斷。當時學校規定，若能考到前三名，學費便全免，書簿費和校服也由學校供應。所以我決定發奮，每年考試也要爭取考入前三名，不然就沒書讀了。那時我盡量爭取讀書機會，掌握更多知識，希望將來用得著。

我在東華義學讀到四年級，抗日戰爭就爆發了，因而學校開始停學。這四年裡，我用心讀書，平平淡淡過每一天，沒有甚麼難忘經歷。當時同學關係很好，大家都很善良，有兩、三個同學和我的感情較深，可惜現在已失去聯絡。我們很尊重老師，也很聽話，不會做出反叛的行為。因為學校經常換老師，每位老師在校時間都不長，所以我記不起他們的名字了。不過我記得校長姓蕭，平時稱他為蕭校長。學校提供課本，不用自己買。抗日戰爭時因要走難，帶個包袱和幾件衣服便走了，所以我沒有保留當年的課本。戰爭時生死未卜，不是被打死就是餓死，能夠生存已經很不容易。

十一、二歲時，香港淪陷了。記得那是 1941 年 12 月 8 日，我和一些小朋友在渣甸山放風箏，看到日本人空襲啟德機場，起初以為是演習，但後來看到飛機起火，便知大事不妙，日本人真的打來了。我們立刻回家。那時所有學校都停課。日本人佔領啟德機場後，多次進行炮戰，大家怕被炮擊中而四處走避。

我家來不及準備甚麼，母親只能多買一點米糧。如果沒有糧食，我們就去馬場附近掃些麥米回來煲粥。因為我們是小孩，那些日本兵不理會我們，任由我們掃麥米。每天早上，媽媽會煮粥和炸油器，在街邊售賣，以維持生活。

對淪陷時的情況，我其實沒甚麼感受，只知道人人都找安全的地方避炮彈。我們想搬離灣仔，但找不到容身之所。當時只有灣仔石水渠街有房子，如想去防空洞，就要到大佛口。我們只有在炮戰時，才離家走去防空洞，待炮戰結束便回家。還記得陸軍醫院就在律敦治上

面。醫院上有英軍炮位，當時香港的英軍和九龍的日軍互相對射，日軍用排炮打過來。我們很害怕，不敢留在附近，所以去其他地區躲避，等炮停了再回來。有一次，我經過灣仔郵政局時，有個炮彈突然在附近的小花園爆炸，把我震得飛起來，彈到騎樓上，⁵我不知暈了多久才醒過來，幸好沒有受傷。如果當時被破片所傷，我肯定沒救了。醒來後，我自行回家。後來得知在英京大酒家對面的鄧大屋前，約有二十人被炸死。他們剛好經過陸軍醫院，而炮彈在灣仔道口爆炸，所以全被炸死。我外出時，看見他們的屍體還在那裡，沒人收拾。那時香港遇上空襲，響起警報，聽到後要靠自己的直覺作出反應。又有一次，在石水渠街門口發現了一個長二尺多的炮彈，幸好沒有爆炸，否則整間房子都被炸掉。

香港打了十八天的仗，12月25日終於投降。當時有日軍在跑馬地站崗，行人走過，一定要向他們鞠躬，否則便被踢。關於日本人入城，他們是騎馬從中環入城的。當時我沒有出外看，但有消息流傳出來，說日本仔入城了。入城後，日本人把所有的英國人送去集中營，又要我們改用軍票，港幣四元換一元軍票。如果沒有糧食，就一定要用軍票購買，港幣已經作廢了。淪陷後，香港糧食供應不足，日本人就盡量疏散香港人，說如果大家熬不住饑荒，就回大陸去。那時日本人製造了幾艘難民船，把部分香港人運送至大陸，地點就是番禺市橋的唐家灣。

離港返鄉

聽到這消息，我們一家五口決定離開香港。1942年初，就是香港淪陷後的第二十幾天，我們登上簡陋的木船前往唐家灣。那時有幾十人同船，我們只帶了一些日用品和衣服，其他物品就盡量不帶，全扔掉了。我們在上環附近的三角碼頭上船，船費全免。我記得登船時，不須辦甚麼手續，只須出示一張日本人簽發的臨時證明書，證明你要離港返鄉了。

那艘船速度很慢，走了六、七小時，才到達市橋的唐家灣。我們在唐家灣的碼頭登岸，登岸後便立刻步行上廣州，或上韶關。當時最多香港人去的兩個地方，一個是韶關，另一個是桂林。我們選了韶關，因為它較近，桂林實在太遠了。我們想由唐家灣步行至廣州，然後偷越封鎖線，北上經花縣、英德、清遠，再到韶關。那時韶關是粵北的大後方，而李漢魂正在當廣東省主席。

由市橋步行至廣州，需時一兩天。沿途有很多農村，也有很多土匪，他們勢力很大，而

⁵ 騎樓為廣東俗語，即陽台。

我們卻毫不知情，不管甚麼，只知一直前行。幸好土匪沒有騷擾我們，也許看到我們是難民，無依無靠，又沒有東西可搶，所以放過我們。那時我們幾十人一同北上，沿途吃自己帶來的乾糧，有軍票的人也會買些東西吃。回想起來，那段日子真是艱難！天黑時，如果走到祠堂或者車站，便停下來借宿一宵。

後來我到了封鎖線，就在附近等待機會。日本人當時會開放一條路，讓人通過，他們不想太多人留在廣州，影響糧食供應，所以就放人北上。但當他們下閘，就不准通過了。封鎖線在廣州郊區，白天時人們無法越過，但到了晚上，閘門打開了，大家便趁機越過封鎖線。不過萬一日本人用機關槍掃射，那些人就沒命了，所以情況還是很危險的。戰爭時，生命很脆弱，朝不保夕。雖然那時我只有十幾歲，但也不管了，總之要偷越封鎖線。

最後，我們成功越過封鎖線，偷渡到花縣。那是中國管轄的地方。國民黨為了阻止日本軍車經過，就把鐵路、公路全部炸掉。我們只得帶著乾糧徒步上韶關，走了約一、兩個星期。沿途很荒蕪，只有農村。終於，我們走到韶關的黃田壩，那裡的居民大都是香港人，他們用竹搭建小棚屋暫住，有錢就把棚屋建得好些，沒錢的就建得簡陋些。我們也找了個地方，買些竹子，一家大小總動員搭建棚屋，就這樣找了個棲身之地，安頓下來。

兒教院

那時韶關有個救濟總署，接濟世界各地的華僑，小孩子可以報名去吳菊芳的兒教院讀書。經別人介紹，我決定到兒教院去。1942年四、五月間，我入住了何巧生的三院。它位於沙園，後來我轉入七院，弟弟去了另一院。當時兒教院分很多班，分班前，院方問我從哪裡來，我答從香港來。他說香港來的就入僑生班吧。這樣我就獲編入了僑生班。僑生班是為華僑子弟而設的，屬另一組織。那時我們叫華僑而不叫同胞，我的同學均是美國、英國、紐西蘭、澳門或香港這些地區的華僑。他們回不去原居地，只好留下來。例如有個來自紐西蘭的僑生，他到中國後便回不去紐西蘭，因為沒有回航飛機。我們關係很好，全班幾十人一起讀書，一起生活，模式跟一區、二區、三區的班別一樣。在當時來說，僑生班的資質比其他的要好一點，因為大家在外國受過教育，比較聰明吧。

我入住兒教院，主要是想維持生活和繼續讀書，因一切費用全由國家承擔。僑生班的男生比女生多。我們當時要穿校服，它很簡單，是黃色襯衫及短褲。宿舍在僑生班教室附近，師生平時以廣東話溝通。當時女老師的年紀很小，多是十幾、二十歲。老師輪流教我們，我

們會學算術、作文、國文，但沒有英文。我們也會上體育、音樂和美術課，不過美術課相對較少。

我們的生活很有規律。睡覺是兩個人一張床，分作上、下床。每人有一床被子和一張毛氈，老師教我們折被子，要把被子折到起角，弄得齊齊整整的。早上，老師會來檢查，如果發現誰把床弄得很亂，就要罰站。我們很聽話，被子都被木板壓得整整齊齊的，故未曾被罰。早上七時起床，我們便去河邊洗臉。那時甚少有機會吃早餐，通常要到中午才吃東西。上課前，還要去操場看升旗和唱國歌。國歌是唱《三民主義》，是用粵語來唱的。唱完國歌就聽訓話，內容多跟國家民族有關，多由院主任或導師負責，而院長就較少出來。當時三院的院主任是何巧生，七院的是徐蕙儀。我們在操場上列隊，一區、二區、三區、僑生班等各自列隊聽訓話，聽完就去上課。

十二時食午飯，那時吃的是糙米，就是那種沒褪完米皮的紅米。我們差不多吃三碗飯才飽，飯是隨便吃的。那時菜和肉均很少，只能吃米飯，但大致能吃飽。院方又規定每月可吃兩次肉，有二兩牛肉和二兩豬肉。飯後，有自由活動時間，我多去散步，然後小休一會兒，聽到鐘聲，再去上課。

兒教院是全日制的，每天下午四、五時下課，下課後自由活動，我們可以到處走走。當時很少人能離開學校，因為有校警看管，況且大家能去哪裡呢？此外，關德興曾在學校粵劇團教過粵劇，⁶又有女拳師林少立在運動課上教我們功夫。林少立真的很威風！那時我沒有參加粵劇團，倒向林少立學過幾天功夫。學校有很多活動，我喜歡游泳、籃球、足球和打鋼架等，活動設備全是學校提供的。游泳就是在河邊，我在香港時學會了游泳，故有時也會游泳。我在學校的作文比較好，運動也不錯。我們通常在教室溫習，很少在宿舍。當時整所學校都有電力供應，不用點油燈和蠟燭，但電燈的光線比較弱。晚上九時、十時便睡覺，睡覺前很少集會或聽訓話，老師有時也會巡視房間，看看我們睡了沒有。

記得 1943 年年底，七院曾緊張地撤離沙園，遷往湖南金雞嶺。當時七院從幾百人中挑選了最精壯的二十個男生和二十個女生進行體能訓練，我是其中一個。我們接受了幾個月的精英訓練，天天跑步、鍛鍊體能和游泳，其間有軍官監督。晚上，男女生全睡在禮堂裡。此外，院方還向我們灌輸了國家民族意識，鼓勵我們將來加入政工隊或者其他組織。後來因應「十

⁶ 關德興為香港著名粵劇演員、電影演員、粵劇編劇家及武術家，曾被兒教院聘任為戲劇總指導。見《烽火歲月的豐碑：廣東兒童教養院院史回憶錄》，廣東兒童教養院院史編輯組編，1995 年，頁 162。

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我們接受了很多訓練，過程頗辛苦。

訓練結束後，院舍發生甚麼事，院方都要我們這班精英幫忙。我們試過在四邑搶救一批患病或瘦弱的難童回來，給他們縫製衣服。那次非常辛苦！後來院方送來一批布，我們把它裁好，縫成衣服，送給難童，又照顧他們。我們稱那些兒童為「鐵線隊」，他們真的很慘，有的很瘦弱，膝蓋比腿還要大；有的患病，身體很弱。成功救回來的兒童，本來已經不多，當中又有差不多一半的孩子最後還是死了。

那時在沙園訓練營附近有一條小河，河的對岸就有一間健康院。那時我很強壯，沒有人入過健康院。不過當時有幾種常見的毛病，第一是發冷，因為粵北的水很寒，體魄不夠強健的人很容易染上發冷病，一旦發冷，就要去健康院看病，拿藥丸吃。那時有很多人患上此病，特別是在湖南的期間。因為湖南山林瘴氣很重，很多人抵受不住，就發冷了。在湖南，我們這種不吃辣的人，也要吃辣椒，因為辣椒可以禦寒。湖南每間屋子的門口，都掛滿辣椒，我們經過民居時，可以摘一點來吃。第二是痢疾，患者的腸胃會很難受。第三是夜盲症，患者在晚上看不見東西。我身體比較強壯，沒有患過這些病，而學校還希望我照顧那些染病的同學。我記得醫生吩咐那些患上夜盲症的同學，要把鍋灰和豬潤混和在一起吃，⁷說這樣可以治病。我對這番話，印象非常深刻。

那時糧食不夠，很多同學迫不得已去偷鄉民的花生和蘿蔔來吃。有部分居民頗同情這些學生，但有一部分很不滿意。雖然兒教院也講規矩，但學生犯了這些事，也不會受到很大的懲罰，多是記過及反思。在那個國難時代，大家都很理解學生這些過犯。

抗戰的時候，為了訓練孩子愛國和奮發圖強，兒教院教同學唱很多抗戰愛國歌曲。那時最雄壯的就是《義勇軍進行曲》，即今天的國歌。此外，每天升旗禮時，也會唱院歌。院歌是由黃友棣先生作曲。黃先生很少在院舍任教，也未教過我。

後來三院更名為七院，那時三院在沙園，何巧生任院主任。更名的七院由徐蕙儀接任，院址同樣在沙園。事實上我來兒教院時，已經見到吳菊芳院長了。她不教書，有時會跟我們訓話。她雖是外省人，但廣東話講得很好，真是說話的天才。吳菊芳在學校有時會穿那種黃茄色的軍裝，非常英偉！徐蕙儀有時也穿軍裝，但何巧生就不穿。我也見過李漢魂，因為在

⁷ 豬潤為廣東俗語，即豬肝。

力中時，他的公館就在附近。晚上，他從公館出來散步時，會見到我們這些學生。他作戰時，炸彈影響了他的耳朵，導致聽力受損。

在七院時，有所謂的「三民主義青年團」，是讓同學學習當精英的組織。那時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是要申請的，要求也很嚴格，就像加入共青團一樣。我們兒教院的口號是「家校營場」，即是把兒教院當作家庭、學校、訓練營及工場。兒教院的畢業照上也印有「家校營場」這句口號。「家」就是家庭集體生活，「校」就是讀書上課，「場」就是學習做東西。那時我們要學習打腳綁，造草鞋。因為資源缺乏，很多東西均是自己製造的，造好就把部分留給自己，剩下的就分給別人。「營」就是訓練營，即把青年人訓練成為擁有多一點技能的人。

此外，兒教院還會教我們人生哲理。它悉心栽培孩子，希望對國家有貢獻。當時社會環境十分艱難，李漢魂和吳菊芳卻爭取到國家的支持，培養我們這班孩子，可真難得。當時全省只有幾萬人，而加入兒教院的我們叫做「我們七千個」，因為兒教院有七間院，每間院有一千人。「三萬人」這個數目是指招生人數，當中有的念到畢業，有的中途離開，也有很多的去世，所以具體數目也不清楚。

我算是學校精英。我擅於作文，作品經常張貼在教室。我為人活潑好動，熱心助人。說真的，我們這群僑生身體較好，知識水平也稍高，又見過世面，所以學校重點培訓我們。那個紐西蘭的同學曾經考過少年空軍，我在七院時也報考過。那時國民政府由南京轉到重慶，號召青年人參加少年空軍，當中精銳的同學會去重慶受訓。1944年，我也去報考少年空軍，但由於個子較小，最後落選了。那個紐西蘭同學，雖然他體格達標，但最後都去不成重慶訓練，因為空軍對體能和學識的要求實在嚴格。記得好像只有兩個同學去了重慶訓練，一個叫熊華川，另一個叫區嘉禾。區嘉禾前幾年過世了，熊華川還健在。

後來國民政府組織緬甸遠征軍，號召「十萬青年十萬軍」，我也參加了。但最後沒有去，反到了力行中學升學。那個紐西蘭同學成績沒有那麼好，就去了北職升學。

力行中學

我在兒教院住了兩、三年，大概從1942年到1944年。1944年，我到力行中學讀一年級。當時同學的第一志願多是力行中學，第二志願是江村師範，第三志願是北職。力中是正選，人人都想入讀，若然成績不好，肯定無法入讀。吳院長親自面試挑選學生，首先她會跟你談

話，有問有答，然後看體型，看樣子是否端正，過程很嚴謹，所以力中非常難考。我在七院成績比較好，加上樣貌端正，所以獲吳菊芳選中。

力中在黃崗，離沙園有十里、八里路程，要乘火車前往。因為我們是國家出資栽培的，所以拿著學生證可以免費坐火車。李漢魂將軍是力行中學的董事長，吳菊芳的地位在校長之上，跟董事長差不多。他們夫妻倆均很重視力中。力中是韶關最高級的中學，吳菊芳希望為國家培養一些精英。力行中學有初中及高中，我們在高中時還要接受正式軍訓，練習使用那支七斤半的七九步槍。

力中要穿校服，很正規的。校服是米黃色的恤衫和短褲，款式不分男女。男生全部剪平頭裝，女生可留短髮。那時我在學校住宿，其間有一個月時間可以返韶關探望家人。與兒教院比較，力中各方面均較先進，校舍環境也比較好。因為學校是新辦的，校舍也是新建的，課室、宿舍遍佈山頭，規模很大。力中的學科跟普通中學一樣，有英文、國文、算術，歷史、地理、音樂、體育等。教英文的老師姓彭，來自香港。至於物理，因值戰時，教得少一點。李湏是我的同學，⁸我們是最後一屆，即第五屆校友。但我在學校很少碰上她，因為大家來自不同班別。學校有很多班，每班有三、四十人。

不久，韶關情況危急。有一天凌晨一時，聽說日本人即將抵達韶關。李漢魂將軍原來養了一些羊，那時院方馬上殺羊，將羊肉、羊腿、內臟等分給學生，每人可分得幾塊，全是生的。然後，他又發了八十支中正式步槍給同學，⁹用以保護學校。那是最先進的中正式步槍，每支有七斤半重，當時初中生沒有接受軍事訓練，所以由高中生使用。在大撤退時，除了衣服，其他物品皆丟掉，然後我們一千多名師生，從南雄、始興一直北上。我們先到廣東和江西的分水嶺，再從江西回到三南。想起來，那段日子真不容易！

廣東和江西的分水嶺有很多土匪，我們早上上山，晚上下山。當時廣東省銀行知道自己只有三十支槍，而我們有八十支槍，就跟我們聯成一隊。我們分成三段走，到分水嶺時，那些土匪突然打冷槍，學校便立刻吹軍號，把所有槍上膛。那時上膛聲震撼了整座山，土匪見狀，就不敢出來。我們下山時，又遇到另一幫土匪，他們抬著七九和六八的舊槍，說是遊擊隊，歡迎我們。但我們不為所動，最後下了山。這些事，讓我留下深刻印象。

⁸ 李湏為李漢魂將軍和吳菊芳院長的長女，1933年生，因為湏江從廣東北部流下，故名之。見李湏《花開夢懷》，汕頭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59。

⁹ 1935年鞏縣兵工廠生產的步槍，它為德國M1924式毛瑟步槍的中華民國授權版，稱為中正式步槍。它漸取代漢陽八八式步槍，成為國民革命軍的制式步槍。

我們的隊伍有上千人，大家一起翻山，浩浩蕩蕩的，規模很大。那幾十個廣東省銀行的人只有三十支槍，如果不跟著我們，早就遭害了。沿途每人分吃乾糧，連夜趕路，甫抵江西，竟然下雪。我們在廣東出發時，沒有下雪，想不到到了江西，竟然下起雪來。當時橋面很窄，積滿了雪，一不小心，就會掉進水裡。我們皆脫了鞋子，涉水渡過。河水真的很冷，很多人的腳都凍壞了，但也沒辦法。這算是最艱苦的一後路程。記得我們抵達某地後，有人收容我們。我們在那裡休息了三天，靠吃番薯乾糧度日。至於睡覺，由於人多，女生盡量睡在屋子裡，我們男生就睡在外面。記得我被分派到屋簷下面睡覺，雪花不時從外面飄來，落在身旁。因為天氣寒冷，我就把一些厚的衣服鋪在地上，睡覺時又用棉襖包著雙腳。

我們到達江西，第一站到虔南。當時我和十幾個同學雙腳已經凍壞了，跟不上大隊。學校就叫我們先不要走，暫時留在虔南衛生院，待腳醫好後才走。於是學校給我們一個月的糧食錢，讓我們留在那裡，由虔南衛生院的人照顧。那時已過了打仗的危險期，我們也不需要槍來自衛。但兩天後，得知日本仔好像要攻打過來，衛生院不得不疏散。院方跟我們說大家要離開了。那時我腳傷未癒，但不得不要扶著拐杖，慢慢地走，每天大概走兩里路。那時我們男女同行，男的佔三分之二，女的佔三分之一。我們十幾人真是患難之交，在那個陌生環境中互相支持。大家生存意志均很強，相信堅持到底一定能夠生存。

我們這樣一直走，到晚上走不了，就去村民的祠堂借宿，吃一些番薯乾或者其他乾糧。有時也向當地鄉民求助，希望得到一些禾草，因為祠堂泥地濕氣很重。睡覺前先把禾草鋪在地上，後鋪上一張氈子，這樣會睡得較好。我們走到那裡就睡到那裡，天亮後再走兩、三里路。我們原本想按照學校路線走，先到龍南、定南，再到和平。因為學校每天走五里路，但我們只能走兩、三里，要花了兩、三天時間才到龍南。從龍南去定南，要走山路，對我們來說，實在困難。因此，我建議先去找那個龍南的運輸大隊長。我們找到他後，跟他說：「我們是國家培養的孩子，現在落難江西，腳又都被雪冷傷了。」那個大隊長很善心，說：「這樣吧，我盡量安排你們坐貨車走。每輛車坐三、四個人，大家分開走。」我們非常高興，就坐貨車走了。那些貨車的款式很舊，是燒木炭的，既載人又運貨。上陡嶺時，因為那種車的馬力不夠，難在泥地上爬坡，我們要下車幫忙推車。結果花了幾小時，車才能上山。

我們幾經辛苦，終於來到定南。因為那裡山很高，我們就安定下來。接著，我們又從定南走去和平。有些以前七院的同學在北職讀書，他們那時仍留守和平，我們就去會合他們。

他們告訴我們學校剛剛撤離，可以慢慢跟上去。我們一路追趕，到了老隆、龍川，終於趕上學校大隊，和他們會合。那時大家很高興，聽說學校很擔心我們，幸好最終平安無事。

1945年，我們從老隆、龍川一直走到梅縣鶴市，這才安頓下來，把大本營設在鶴市。學校在老隆安頓下來後，安排了臨時教室給我們上課。我們每人都有一張竹凳子和一塊木板，若論教學設備，當然比韶關簡陋多了。上課時，老師在黑板上寫字，我們就用紙和鉛筆抄寫。在老隆逗留了幾個月，到八月，日本投降了，我們便租了幾條船，沿著東江去廣州。那時廣東省的省府，已經遷回去廣州了。

那時剛打完仗，社會很混亂。經過東江時，我們看見有很多廣州市的小孩被拐到那裡賣，因為東江人較有錢，會買女孩子來做童養媳，或者買男孩子來做苦工。當時學校還救了一個童養媳，把她帶回廣州。她很小的時候，就被人從廣州拐到東江，獲救時差不多已經二十歲了。後來那些有錢人派人來要人，因為我們有八十支步槍，他們不敢動，所以學校把她帶下船，不讓那些人來檢查，最後順利送她回廣州。

大撤退時，吳菊芳沒有與我們同行，因為她家在韶關，李漢魂將軍也在廣東省。他是怕學生受害，所以半夜叫師生撤退。回想起來，這段旅程相當艱苦，不過我們並不計較，只要沒有傷殘就可以了。我們幾十人互相扶持，同生共死，在那個死亡圈裡掙扎出來，所以感情很深厚。我每次回廣州，見到那些舊同學，都會緬懷大家共患難的歲月。

回港生活

1946年初，我回到了香港，當洗車工人，每天有五角錢，一個月就有十五元，這讓我解決膳食問題。由於戰亂的影響，當時香港有很多業主都已經走了，或甚至死了，所以留下很多空置單位，尤其在駱克道和軒尼斯道一帶。那時，只要你把麻包袋放在那些單位裡，就可以隨便住。

兒教院和力行中學對我們的影響力很大。在那麼艱苦的環境中，能作育英才，是相當難得的事。我很佩服吳院長那種崇高的精神。1992年她從美國回來時，我們非常感動，一路陪她上廣州，和她吃飯見面。那一年，她應該八十多歲了，但樣子依然慈祥，也很關心我們。我現在還記得她的樣子。

總的來說，這些經歷對我人生有很大啟發。第一，是生存意志一定要強；第二，思想要

正確，不要損人利己。一直以來，我都按照這種信念去做事。人本來很單純，但經過戰爭洗禮後，人生觀就變了。如果不踏踏實實地發展事業及建立人際關係，始終難以在社會立足。所以，只要是對社會和校友有益的事，我都會竭盡所能，盡量去做，反正再艱苦的事，我都熬過了。我的子孫個個都有自己的發展，能獨立生活。現在我已經很安心了！



李松柏 (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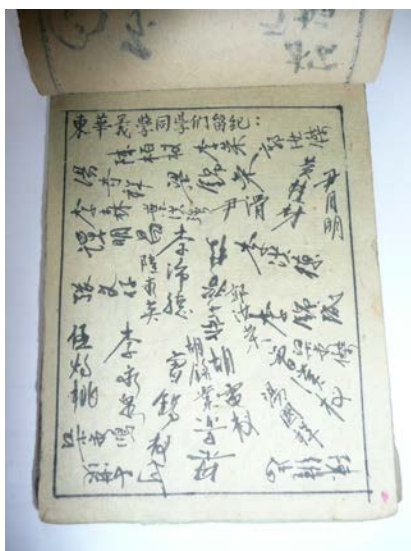
李先生翻閱兒教院的紀念冊



1941 年李先生自製的兒教院紀念冊，內有同學名單



紀念冊內兒教院同學簽名



紀念冊中載有香港東華義學同學簽名



李先生珍藏「七七事變」五週年紀念首日封 (1942)